

半城市化地区的发展特征与演化机制研究

——基于江阴的案例

唐伟成 彭震伟¹

【摘要】半城市化地区是传统城乡二元系统中出现的过渡性地域类型，其形成无法脱离特定的转型背景与社会语境。村庄单元是形成中国半城市化地区的重要空间组织与资源配置单元，对下衔接各类微观经济主体，对上响应宏观政策与区域发展等外部进程。基于村庄单元这一中观视角，选取江阴市周庄镇与华士镇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案例地区在空间、经济与社会层面突出的半城市化特征，进而从村庄的路径建构条件、发展内在逻辑与调整扩张形式三个关联的环节解析由村庄单元驱动的地区演化机制。集体制与有限土地资源是村庄的固有属性，导致工业资本的内在紧张与持续扩张，村庄成为半城市化地区的前缘拓展空间。最后认为，如何构建有序合理的空间结构，引导空间、产业与政策的协同是中国半城市化地区转型的关键。

【关键词】半城市化 村庄单元 驱动机制 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363 (2020) 05-0062-07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伴随着经济要素在城乡、区域之间的流动重组以及社会、治理结构的相应变迁。始于1970年代末，资源要素的长期固化使其在城镇化恢复与加速的初始阶段便具备了动态、不均衡的特征。在中央经济分权与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城乡要素开始加速流动，地域结构演化与城镇化进程出现新的动向。在空间布局上，伴随着对外开放的国家政策与城市试点工作，沿海开放地区的市场化先行地位得以确立，这些地区在之后的阶段起到发展引领、吸引资本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赵燕菁，2000）。从时序上观察，村镇工业经济的起步早于全面开放与城市改革进程，村镇工业的持续壮大形成了由边缘经济角色主导并超出中央预期的增量改革（P.C. Huang, 1990; 刘守英，王一鹤，2018）。空间与时序因素的叠合，引致大规模人口导入与生产功能发育在部分先发区域（特别是东部沿海）的村镇同步发生，村镇人口、产业与空间的互动催生了大量半城市化地区的出现。

作为一种不完全城市化的过渡性地域现象，中国半城市化地区的形成有着独特的宏观背景、地方条件与演化机制。在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区域内，控制集体土地的村庄单元为积极应对外部市场竞争环境，形成了一个个具有强大驱动力的发展主体，利用廉价的集体土地进行密集的非正规开发。村庄的自主发展导致地区的空间碎化与用地蔓延问题，同时加速了地区的半城市化进程（J. Zhu, T. Hu, 2009）。由此可见，村庄是形成中国半城市化地区的重要空间组织与资源配置单元，同时也成为观察半城市化地区形成机制的关键视角。从现实发展来看，半城市化地区作为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阶段面临着产业、空间、政策以及区域整合等诸多问题，历史因素与传统路径制约了地区的转型。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在梳理半城市化理论的基础上，选取典型案例地区，从村庄单元驱动的视角解析其特征机制，探讨地区转型对策。

1 半城市化的相关研究进展

¹**作者简介：**唐伟成，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wchengtang@tongji.edu.cn

彭震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导，通讯作者，pengzhw@tongji.edu.cn

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县域村镇规模结构优化和规划关键技术”资助（项目批准号：2018YFD1100802）。

1.1 理论建构的差异社会语境

半城市化现象的研究与理论建构形成于不同的社会语境。半城市化现象缘于欧美发达国家，之后出现在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引起了学术界的相应关注。欧美国家的半城市化驱动主要来自于城市功能与人口的空间外拓，如交通工具革新与通勤范围扩大、中产阶层居住郊区化以及企业与研发机构向城市周边地区布局等因素（陈雪明，2003），在此社会背景下进一步提炼出城市边缘区、边缘城市以及大都市拓展区等以城市为主体的地域空间概念（R. J. Pryor, 1968）。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发展背景不同，带来半城市化特征与机制的显著差别。欧美国家形成半城市化理论的基础是城市中心论，研究范围主要聚焦于都市区边缘或大城市周边，这与发展中国家基于区域城镇化或乡村驱动在半城市化过程有着较大的差异（D. Webster, 2002）。较为典型的如麦基（T. G. McGee, 1991）在研究亚洲的城市化问题时发现，非农人口与产业在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走廊地带、新发展区域或是临近大城市的乡村地区集中，从而实现以强烈城乡互动与区域为基础的不完全城市化过程。

半城市化理论虽建构于不同国家自身的社会语境，但这些理论可以为中国半城市化研究提供参考。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便出现了乡镇工业推动下的农村城镇化现象，而引入半城市化的学术概念开展研究要到 21 世纪初。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半城市化的概念、地区类型、特征、机制与政策等方面（刘盛和，等，2005；王春光，2006；陈贝贝，2012；杨忍，等，2018）。然而中国的半城市化现象产生于独特的转轨阶段与制度背景，受政策体制的深刻影响（F. Wu, 等，2013）。在城乡二元体制分割与乡村工业化的推动下，中国的半城市化呈现出强烈的自下而上特征（田莉，戈壁青，2011）。由计划时期延续而来的集体制土地制度促进了乡村要素活跃，但也带来土地利益及权属关系的交织，地方管理部门难以对集体土地上的非正规建设行为进行有效管控（朱介鸣，2016）。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较快或是非农机会较多的地区，村庄进行土地开发与社会经济重构的意愿强烈。国内已有的研究主要从区域、产权与空间视角去解析半城市化地区的发展，但少有研究从地区内基础的资源配置与管理单元，即村庄这一中观发展尺度进行深入解析。本文认为村庄是半城市化地区形成与空间前缘拓展的基础性经济单元。基于村庄单元这一研究视角，有利于在统一内外部动力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半城市化地区背后的逻辑、特征与机制。

1.2 本文分析框架

半城市化地区村庄驱动的发展演化过程与村庄的固有属性相关。村庄的属性可以归纳为小尺度的发展空间、稀缺的土地资源及其集体所有性质。村庄作为具有一定自治属性的单元，人口与集体资金积累有限，土地是村庄内部最重要的发展资源。集体土地的产权与主体相对模糊，农地转为非农用地具有级差地租，集体土地价格低廉。这些内在属性塑造了半城市化地区的村庄在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逻辑：第一，追求土地开发的回报，产业的门类选择需遵循这一经济原则，在狭小的空间内发展工业比农业与服务业的回报往往更高；第二，土地资源需得到充分利用与空间安排。随着产业在村庄内的发展，土地稀缺度提高，围绕土地的整理与空间重构活动将加快实现；第三，村庄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内部最优。在村庄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了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人居、村民福利等其他方面的关系，村庄的人居条件与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将同步推进。在上述发展逻辑下，村庄内的工业资本得以形成与发展，并产生了持续的空间诉求与内在紧张。而受限于有限资源的村庄单元，用于协助与缓和工业资本扩张的方式却相对有限。在村庄工业资本的扩张与村集体的不断协调与空间供给下，各个村庄成为半城市化地区空间拓展的主体与前沿阵地，加速了半城市化地区的形成以及建设用地的全域蔓延（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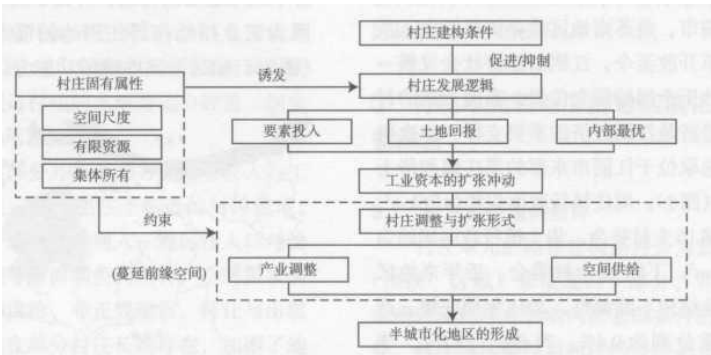


图 1 村庄单元驱动视角的半城市化演化框架

值得关注的是，村庄个体的发展还受限于村庄的内外部建构条件。外部建构条件是指宏观政策与区域发展等外部进程，内部建构条件是指村集体的决策能力、行动与人力资本等因素。村庄处于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底层，村庄在不同节点上的决策行动与内外部因素的有效结合程度对于村庄发展逻辑的运作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村庄作为一个中观发展尺度，对上需辨析国家宏观政策与区域发展环境，应对外部环境的持续变化形成内部的响应、调整与行动；对下应衔接各类经济发展微观主体，为其提供产业用地，非农经济活动与土地开发将加快改变半城市化地区的土地利用格局。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首先从空间、经济与社会方面分析半城市化案例地区的发展特征，关注村庄个体发展的外在表征，进而从村庄单元的建构条件、发展逻辑与扩张形式三个关联的环节去解析地区的演化机制。

1.3 实证案例选取

江阴市地处长三角，行政上隶属于无锡市，是苏南地区重要的县级市。从改革开放至今，江阴的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高度发展的村镇经济是江阴经济的重要支撑。本次研究选取位于江阴市东部的周庄镇和华士镇（图 2）。周庄镇行政面积约为 76km²，下辖 15 个村委会，华士镇行政面积约为 75km²，下辖 27 个村委会。近年来地区产业结构不断调整，2018 年周庄镇三产比重分别为 0.4%、71.6%、28.0%，华士镇分别为 0.5%、65.9%、33.6%（江阴市统计局，2019）。工业保持高速增长，2018 年周庄镇工业增加值为 257.4 亿元，华士镇工业增加值为 217.6 亿元（江阴市统计局，2019）。非农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大量外来劳动力。但地区城镇化率的提升与经济结构升级不相匹配，2018 年周庄镇的非农户籍人口占到户籍总人口的 44.1%，华士镇仅为 24.5%（江阴市统计局，2019）。除了经济与社会方面，地区的形态与景观也已呈现出明显的半城市化特征与村庄驱动痕迹，这些方面值得进一步研究。



图 2 研究案例区位图

2 地区半城市化特征分析

2.1 空间形式：以村为单元的建设用地蔓延

案例地区总体上呈现出碎化、拼贴的土地开发特征，村庄是基础性的空间驱动与组织单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集体建设用地全域蔓延。早在 1970 年代末，伴随着村庄工业的起步，廉价的集体土地被投入到工业活动，部分村庄的用地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村庄工业在短缺经济的大环境下发展，集体建设用地保持着持续稳定增长。进入 2000 年，边缘村庄的空间建设活动开始加速，地区局部呈现连片组团式发展。镇工业园的设立对于控制村庄工业发展冲动的成效并不显著，产业用地相对分散在若干村庄主导形成的工业区，如华宏、三房巷与华西村工业区等。至 2010 年，两镇工业用地占城镇建设用地比例均已超过 50%^①。2010 年以后，地区建设用地已经呈现出跨越村界、全域蔓延的格局，并在小尺度上稳固为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的混杂交错（图 3）。地区缺乏明确的功能分区，不同用地之间存在相互干扰与制约。集体土地的供给接近极限，倒逼地区进入存量

调整的阶段；第二，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失衡。两镇镇区的功能发育相对薄弱，公共服务功能不仅集中在镇区，还分布于华西村等经济强村。经济强村服务功能的提升削弱了镇区的服务能力。再加上已撤并乡镇的部分公共服务设施目前仍在运营，镇区的中心辐射作用受到进一步限制。地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共享程度较低，文化与体育等设施配套也相对不足；第三，村镇传统风貌改变，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受到挑战。地区内的自然要素如山体（砂山、定山）、河塘（张家港河、华士河等）与农田被建设用地包围，重要水体缺乏预留空间或生态驳岸，传统村镇风貌逐步被城乡混合的风貌替代。地区以冶金、化工等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对生态与人居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压力。

2.2 经济动力：传统产业主导的内源式发展

经济方式与产业选择受制于地方条件，一旦形成便具有延续性。案例地区承接的城市外迁企业数量较少，区位上不直接毗邻上海，对外资的吸引力相对有限。在 2018 年地区的大中型企业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仅 1 家（表 1）。相比于昆山、太仓等地，地区外资利用率常年保持在较低水平（图 4），反映出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内源经济动力与内生发展路径。外资难以进入村镇地区进行发展，一方面是村镇地区在市场联系、设施配套、技术研发等方面存在着制约因素；另一方面是由于集体土地属性与地方化网络等因素的限制。相比于本土企业，外资企业在村镇地区的资源利用方面存在劣势。



图 3 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在小尺度上的混杂格局

表 1 2018 年地区大中型企业类型及数量统计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32
集体	2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
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外合资经营	1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2

周庄镇与华士镇是江阴传统产业的重点板块，主导产业包括冶金、化纤、纺织、金属制品、装备制造等。这些产业的特点

是工业产值较高，但所带来的社会与生态成本不可忽略。在历经外部环境变化后，地区主导产业在原有基础上拓展，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惯性。受限于资金与技术因素，这些分布于集体土地上的产业普遍面临着转型的压力。总体不高的外资投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产业升级与外部市场拓展的渠道（耿宏兵，曹广忠，2009）。地区传统产业的低效模式与升级困境反过来强化了对低成本集体土地的依赖，大量传统产业的存在会对村庄的长远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辩证来看，地区以内源资本为基础，对外资的依赖性较小，从而能够形成相对稳定与独立的地方发展模式。

2.3 社会结构：隐性城镇化与社会空间分异

村庄的产业发展与内部功能完善带来地区隐性城镇化现象，地区外出人口少，村民向镇区集中居住的意愿不强烈。按照非农户籍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2003 年周庄镇的城镇化率为 22.0%，华士镇的城镇化率为 20.6%（江阴市统计局，2004）。地区的城镇化进程缓慢，至 2018 年周庄镇的城镇化率为 44.1%，华士镇的城镇化率为 24.5%（江阴市统计局，2019）。地区的空间分布、居住模式以及设施供给难以形成总体转变，但局部、自发的村庄改造却在持续进行。低层（别墅）、多层等不同的安置方式，反映出村庄改善内部人居环境与增加工业用地的双重目标与折衷选择。不同类型的村镇居住空间满足不同社会群体需求，同样体现出市场经济与身份认同双重作用下的群体空间分异过程。至 2016 年末，周庄镇外来人口为 10.9 万人，已超过本地户籍人口^②。村镇工业在有效吸纳本地劳动力后，借助于外来劳动力填补工业岗位缺口（图 5）。村庄内高比例的劳务工作由外来劳动力完成（图 6），少数村庄的外来劳动力数量已超过村庄的本地劳动力数量，如金湾村、周西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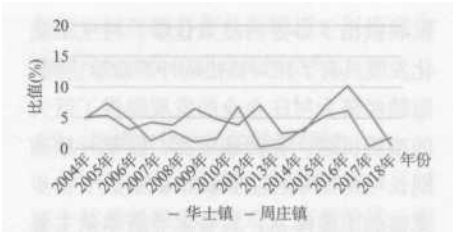


图 4 到位注册外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值



图 5 2012 年村庄外来从业人员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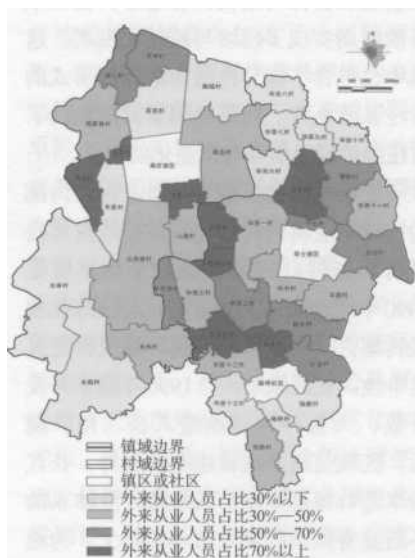


图 6 2012 年外来从业人员与本村从业人员比值

大部分外来劳动力受限于收入与工作地点，倾向租住于临近的村民住宅。外来劳动力大量涌入，地区在人口与治安管理等 方面满负荷运转。空间需求诱发空间供给，非正规建设、转让与出租等活动在部分村庄长期存在，加剧了地区内分散的工作— 一居住分布格局。外来劳动力成为地区重要的社会群体组成部分，人口规模的增加使得集聚效益提高，地区投资中的三产投入 出现增长。相比于区域中的大中城市，乡镇对于外来劳动力的准入门槛较低。但就业机会不稳定、地方政策与社会保障不完善 等因素导致外来劳动力具有高流动的特征，制约了外来劳动力的本地转化与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3 村庄单元驱动下的地区演化机制解析

3.1 村庄路径建构条件

村庄单元的路径建构条件分为宏观（国家、区域）和微观两个部分，并由宏观环境传导并影响内部基础条件的变化。村庄 建构条件对村庄的经济起步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必要的 政策让步，村庄工业化发展具有了相对宽松的外部政策空间，短缺经济为村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在区域层面， 改革开放初期长三角区域各主要城市就形成了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具备工业资本从主要城市向乡村扩散的外部条件，外部的 技术、市场与内部的低成本要素得以实现有效组合与优化配置。在地区内部，乡镇企业在公社时期便具有雏形，在政策开放时 期实现了延续与跨越式发展，这其中也包含了部分注册为集体制形式的村庄私营企业。内外部因素共同推动了村庄经济建设活 动与工业化的起步。

宏观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村庄内部的持续响应将为村庄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国家层面的变化主要是 1990 年代以 来加速的市场化与全球化宏观转型，村庄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具竞争性。在区域层面，1990 年浦东开发开放，大量外资开始 进入长三角。随后，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提升，长江沿岸港口得到开发。长三角产业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区域性市场的扩大， 为地方的产业配套提供了空间。在地区内部，村庄为应对宏观环境的变化发生了两个重大转变。第一，村庄组织形式的创新。 村庄形成企业化的发展导向与体制，很多村庄的企业负责人兼任村庄领导（耿宏兵，曹广忠，2009）。村集体以企业管理的方式 推动村庄资源的整合利用，积极寻求外部合作机会，村庄企业也获得了更为充足与灵活的内部资源供给。村集体则通过参与村 庄工业化获得土地收益；第二，村庄治理能力的提升与企业家精神的成熟。在 1990 年代中后期，地区内的大部分乡镇企业完成 了产权改革。在世纪之交，地区又探索出民营企业上市引资与集团化发展的道路，在“江阴板块”上市的村庄企业有三房巷实

业等。

3.2 村庄发展内在逻辑

中国村庄的固有属性塑造了村庄的基本发展逻辑。在村庄的决策行动与内外部建构条件结合的基础上，村庄发展逻辑得以贯彻与运作。第一，追求土地开发的回报。农业先天弱质，服务业发展需克服规模集聚门槛，有限的土地供给主要倾向于回报高的工业发展。村庄通过地租经济参与工业化，各自在行政边界内建设工业厂房，内部化占有土地农转非带来的级差地租。2016年，华士镇各村土地租金收入7602万元^③，周庄镇各村土地租金收入16949万元，其中仅周庄村土地租金收入就达到5316万元。但乡村企业面临着技术与资金方面的先天短板，这类企业也偏好于价格低廉的集体土地，因此易造成产业升级的困境以及工业用地低水平扩张的内在倾向。

第二，有限资源要素的组织、整合与投入。为了增加工业回报，村庄内部土地资源需充分挖掘。集体土地的归属相对模糊，这为村集体进行土地整理与流转提供了基础。通过内部土地的挖掘与整理，产业活动与经济投资具备了空间载体。于此同时，村集体积极整合内部资源、出台优惠政策，为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外部协调，促进村庄非农经济增长。产业发展推高用地需求，土地稀缺度提高，村庄的土地整理与空间重构活动将加快实现。为了回馈作为土地要素贡献者的村民，村民的人居空间改善也需通过空间的优化布局加以实现。由此，产业发展带动了村庄内部资源的重组以及村庄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的重构。

第三，以村庄内部的效益最优与功能完善为目标。以村为单元的内部化发展路径，村庄的各类设施配套标准与目标人群是以村庄范围内的活动人口为准则，由此带来公共设施的自主配套。在村庄工业化的过程中，需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人居、村民福利等其他方面的关系，相应的村级财政与福利需通过多样化的方式返回给本村村民。2016年，华士镇村民福利支出1.58亿元，周庄镇村民福利支出1.49亿元。村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多遵循了效益内部化与成本外部化的原则，如产业发展中使用大规模价格低廉的外来劳动力，产业用地常借助于邻村租地实现拓展。

在这一发展逻辑指导下，地区各个村庄的工业资本快速形成，产生持续的空间诉求。2012年两镇共有25个村庄的年工业产值达到10亿元，少数村庄的年工业产值超过了50亿元（图7），如倪家巷村的工业产值为61亿元，三房巷村为310亿元。2012年周庄镇各村工业产值合计占镇工业产值的91.5%，华士镇各村工业产值合计占镇工业产值的77.2%（缺华西四村数据）（江阴市统计局，2013）。村庄的工业建筑业从业人员比例极高，地区九成村庄的工业建筑业从业人员比例达到70%（图8）。村庄成为实际的工业发展单元，村庄工业的“过度化”加剧地区空间结构的失衡与整体绩效的下降。工业生产与经济活动分散，反向稳固了地区内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模式，镇总体规划难以对镇工业集中区以外的村庄建设行为进行有效管控。村庄财政、村民福利与集体土地紧密相连，集体土地租金为村庄空间重构与福利水平提升提供了基础，增加了农村集体户口的“粘性”，制约了地区的空间集聚进程。



图 7 2012 年村庄工业产值示意



图 8 2012 年村庄工业建筑业从业人员比例

3.3 村庄调整扩张形式

面对村庄工业资本的快速扩张与持续的空间诉求，村庄单元用于协助与缓和工业资本的方式相对有限，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调整与继续增加空间供给两个方面。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村庄企业除了原有的产业类别中进行升级，还可以采取多元化的产业发展策略。乡村的专业化、特色化生产与新经济要素的结合成为当前乡村产业转型的新动力。村庄企业无法内部化的问题需由村集体进行外部协调，如治理非正规的生产活动与土地开发，建立配备完善的工业园区，强化产业相关的社会与环境评估，提供促进产业升级的具体政策；统筹产业用地与其它功能用地的关系，制定用地计划，通过土地利用的同步调整，为产业的升级、融合以及绿色转型发展预留弹性空间。但相比于城市，乡村在技术研发与人才集聚方面存在一定的劣势，乡村传统产业的升级难度较大。

为了增加产业用地的空间供给，村集体沿着村内废弃地使用、承包地流转与土地指标整理、邻村租地以及村庄撤并的方向演进，体现了土地的低成本使用倾向以及收益内部化、成本外部化的产业空间拓展方式。部分村庄企业在村庄用地稀缺的约束下，通过开放的经济网络对外扩张，实现跨区域的产业用地布局。随着村庄产业的发展，村庄土地的稀缺性提高，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将逐步被经济发展功能替代（唐伟成，等，2019）。最终，村庄采取类似企业兼并的方式撤并周边村庄，由此实现产业空间的外延以及土地资源的一次性扩容。地区典型的案例是华西村。自 2001 年起华西村逐步并入周边 20 个村庄，按照“一分五统”的方式组建大华西村，随后重构村庄空间，布局了南部工业区、中部居住与商业区、北部农业区。大华西村面积接近 35km²，约占华士镇镇域面积的 46%^④。村庄的扩界实现了土地资源与劳动力的快速补充，有利于用地约束的缓和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的内部提升。但村庄空间扩容也会衍生出治理成本上升、福利分配不均、镇区发育薄弱等问题，对村庄与地区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是隐性的、长期的。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基本结论

本文基于村庄单元这一中观发展尺度，对江阴市周庄镇与华士镇组成的半城市化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案例地区的半城市化特征与村庄个体发展密切相关，突出表现在空间、经济与社会方面。地区空间形式体现为以村为组织单元的空间碎片化与建设用地蔓延，经济发展依赖于乡村传统产业主导的内源式动力，社会结构方面则出现了隐性城镇化与社会空间分异的问题。这些半城市化特征是村庄作为地区空间资源配置单元的结果与外在表现，因此地区深层演化机制应从村庄单元路径的形成与强化过程进行解析。地区演化机制由村庄路径建构条件、村庄发展内在逻辑与村庄调整扩张形式三个紧密关联的环节构成。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村庄内部的持续响应为村庄路径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村庄的固有属性如小尺度发展空间、有限的集体土地资源，塑造了村庄独特的发展逻辑，使得村庄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土地开发回报、重新安排内部空间，并以村庄内部的效益最优与功能完善为基本目标。在此发展逻辑下，村庄的工业资本快速起步，产生着持续的空间诉求。村集体通过提供外部协调来促进村庄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产业空间供给，持续的产业空间供给也由内部整理转向邻村租地、村庄撤并等外部渠道，村庄成为半城市化地区的前缘拓展空间。

4.2 半城市化地区的转型探讨

当工业化进程跨过初始阶段后，村庄个体的局限逐步显现。当前阶段，案例地区发展已经表现出土地资源紧缺、环境约束加强、空间结构失衡等问题，早期发展所依赖的要素成本优势在减弱。外部环境发生着深刻变化，宏观经济波动与区域竞争加速了地区转型进程。如何构建合理有序兼具弹性的空间结构，引导空间、产业与政策的协同是半城市化地区转型的关键，也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针对案例地区的转型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设定空间路径。突破镇村边界整合地区空间资源，明确开发边界与空间管制内容，编制面向长期的空间规划。在地区居住空间改造基本稳固的情况下，规划应聚焦于公共服务设施与工业用地在地区层面的优化布局工作。开拓思路，如在工业用地调整方面，借助市场化力量实现工业用地的自发调整；第二，产业创新升级。应充分利用地区已经形成的内生比较优势，如本地产业集群网络、企业家精神与政府治理能力等，推动竞争优势重组与产业技术升级；第三，政策机制保障。在规范集体土地使用的基础上，加快土地国有化进程。创新地方性政策，加速外来人口的本地化。

当然，半城市化地区作为一种非定式、过渡性的地域形式，将来有必要对不同类型地区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总结不同类型地区的特征、问题与机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而城乡规划学科所具备的空间配置能力、手段及其政策属性将在促进半城市化地区向城市化地区转变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江阴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年）。

②数据来源于周庄镇政府部门。

③缺华西十二村和龙河村数据，两个村的数据未计算在内。

④在江阴统计年鉴与市农工办等官方统计口径中，大华西村所属十四个村的社会经济数据单独统计，这十四个村分别是华西新市村、华西一村至华西十三村。

参考文献：

[1]陈贝贝. 半城市化地区的识别方法及其驱动机制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2): 210-220.

[2]陈雪明. 美国城市化和郊区化历史回顾及对中国城市的展望[J]. 国外城市规划, 2003(1): 51-56.

-
- [3]耿宏兵, 曹广忠. 苏南小城镇目前面临的困境与再发展对策——以江阴市澄东片区发展规划研究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09(6): 53-59.
- [4]HUANG P C.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5]江阴市统计局. 江阴统计年鉴, 2003, 2012, 2018[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2013, 2019.
- [6]刘盛和, 叶舜赞, 杜红亮, 等. 半城市化地区形成的动力机制与发展前景初探——以浙江省绍兴县为例[J]. 地理研究, 2005, 24(4): 601-610.
- [7]刘守英, 王一鸽.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 管理世界, 2018, 34(10): 128-146.
- [8]MCGEE T G. The emergence of desakota regions in Asia: expanding a hypothesis[M]// GINSBURG N, KOPPEL B, MCGEE T G. The extended metropolise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
- [9]PRYOR R J. Defining the rural-urban fringe [J]. Social Forces, 1968, 47(2): 202-215.
- [10]唐伟成, 彭震伟, 朱介鸣. 诱致性制度变迁下的村庄要素配置机制研究——基于长三角的案例分析[J]. 城市规划, 2019(6): 40-46.
- [11]田莉, 戈壁青. 转型经济中的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1(3): 66-73.
- [12]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6, 5(7): 107-122.
- [13]WEBSTER D. On the edge: shaping the future of peri-urban East Asia[M]. Stanford: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2002.
- [14]WU F, ZHANG F, WEBSTER C. Inform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demotion of urban villages in the Chinese peri-urban area[J]. Urban Studies, 2013, 50(10): 1919-1934.
- [15]杨忍, 陈燕纯, 徐茜. 基于政府力和社会力交互作用视角的半城市化地区工业用地演化特征及其机制研究以佛山市顺德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18, 38(4): 511-521.
- [16]赵燕菁. 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中国城市化[J]. 城市规划汇刊, 2000(1): 6-12.
- [17]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江阴市中心城区副城片区规划(2012-2030) [R]. 2013.
- [18]朱介鸣. 制度转型中土地租金在建构城市空间中的作用: 对城市更新的影响[J]. 城市规划学刊, 2016(2): 28-34.
- [19]ZHU J, HU T. Disordered land-rent competition in China's periurbanization: case study of Beiqiyia township, Beijing[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9, 41(7): 1629-1646.